

浙江全面启动深化林业综合改革 2020年林业产值达到8000亿元

园林老板和守林员的“一千零一夜”

记者 程鹏宇 实习生 李依婷 通讯员 谢力 高鹏芳

2016年1月1日,浙江省全面启动深化林业综合改革。到2020年,林业行业年总产值将达到8000亿元,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1%以上,全省森林保有量达到9000万亩。

时间回溯到36年前,中国的历史在安徽小岗村这里拐了个弯。

18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哆哆嗦嗦地按下手印,正式掀起了改革的大幕。这一晚立下的破纸条,也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,彻底打破了“一大二公”的人民公社体制,解放了农村生产力。

而当时摸索出来的“分田到户”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等开始向更多领域延伸。

受目前的林业政策法规等影响,“工商资本进入林业限制较多”“国有林场负担重、缺乏活力”“产业层次低、竞争力弱”,甚至“在自己承包的山上砍树也有很多规定”,“在山上建一些基础设施、建蓄水池也要走很多程序,麻烦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办下来”,林户们都期望,“能和当年小岗村那样,把林分到户,保证合法的承包经营,给我们政策上更多的支持。”

如今,这场不亚于当年在小岗村里按手印换来的改革,终于来了。

按照顶层设计方案,国有林场将通过改革实现政府兜底,更多的承担生态公益功能;集体林场则通过改革剥离经营权与承包权,实现林地的流转承包与租赁抵押,最终与市场接轨的目标。这与当初小岗村的改革如出一辙。

集体林场篇:安吉的改革摸索

集体林地承包“只能在农民手里” “灰色流转”开始出现

事前悄无声息。

就像一月初那场“一眼看去都望不到头”的雪。一同来的,还有今年年初刚刚启动的深化林业改革。

“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。”

胡建军并不知道这份改革的文件在去年12月29日的早上就已经下发到浙江,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刚刚在年前拿到手的这几本红色的证。

1月21日,这个在外地“漂”了20年的园林老板从老家安吉的林业局领出了5本《浙江省林地经营权流转证》。这也是安吉发放的第一批林地经营权流转证。

这比他预计的“快了好几个月。”

拿到证的第二天,胡建军就赶紧把这些证带到了自己承包的林场里。

他站在山脚的稻田边,身边堆着“撮起来差不多到膝盖这么高”的合同,和57户林农开了一个会,“这个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流转了多少地,是哪户人家的。我流转来以后要做的事情也会跟你们开会说明白的。”

林农们听完就散了,并没有多说什么,胡建军反而轻松了下来。“我2013年回来,跟这些林户打了3年的交道,一家一家地谈,到今年总算谈了2000亩下来。”一开始,胡建军谈成一户就签一份合同,“面积有大有小,都不一定。有的一开始说写一张欠条就好了,有的又分得很细很细,有多少棵竹子,有多少棵树都要列出来,范围从哪里到哪里也都要标出来。”

这些细致的工作进行了3年,关于“怎么承包”的争论也一直持续了3年。胡建军强调了一句,“那时候我们还是提承包这个说法的。”

在他看来,这两个带着些许时代特征的字眼,“多多少少,也算是个搬不动的石头。”

“就跟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。”胡建军脱口而出。

在这个与安徽只隔了一座山的小县城

里,和胡建军年纪差不多的人依然对分田到户、家庭联产印象深刻。

就在胡建军初中毕业没多久,1981年的安吉也开始实施分田到户。也就在这一年里,安吉的集体林地开始分林到户,“一开始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,很多人日子都开始好过了。很少再听说还有去人家借个菜借点米的事情了。”

时间一久,“一些人就发现,有些人家的山只用了一部分,还有很多都荒着没用。”更主要的是,受时代背景的影响,“这些农田、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只能在农民手里,不能流转给其他人,不然就会犯错误的。”

但在那个“吴仁宝偷偷摸摸办起乡镇企业、王石辞职下海淘金”的大时代里,也有人开始尝试“别的路子”。

胡建军就看到,“一些外面的老板带着一沓钱来安吉承包山林,一次性就付了10年、20年的租金,这可不是一笔小钱。那时候,我们这些一直待在农村的人哪里懂可以租给谁不可以租给谁,差不多都偷偷摸摸地签了合同,再也不管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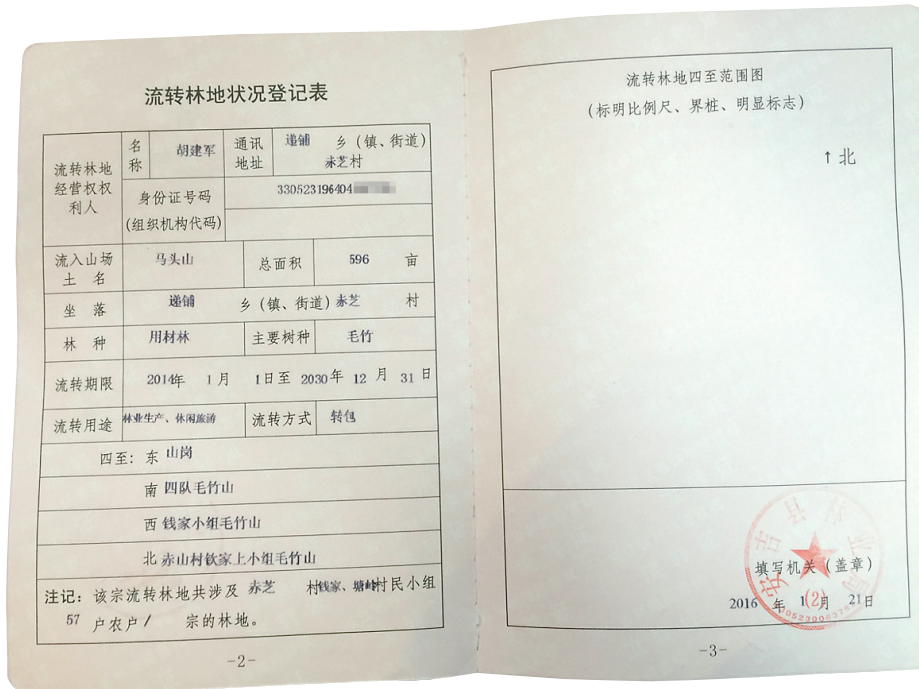
活络的胡建军也开始依葫芦画瓢。“先从我村里开始,让他们把不用的农田、山林都租给我,也没有说租多少年,反正就是一年付一次租金。”没多久,自己也成了别人口中的“万元户”了。

这种“在法律意义上不被认可的”私下转包,并没有受到多少阻力,便传开了,并且一直延续至今。

浙江被率先打破“灰色方式” 允许集体林地流转近1600万亩

直到2013年,这种“灰色方式”才在浙江被率先打破。

2013年8月14日,《龙泉市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管理办法(试行)》出台。在这份文件中,首次将林权中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,形成经营权流转的格局。一个月后,龙泉市民就领到了浙江的第一本经营权流转证。



胡建军拿到了安吉县第一本《浙江省林地经营权流转证》。

在胡建军看来,这块“搬不动的石头”,最后以这种形式出现了。而这,也正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“以前规定只允许农民来承包,现在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,也就允许其他身份的工商资本进入林业了。”胡建军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,“一开始也没多想。”

此时的安吉尚未成为这项改革的试点,所有的承包依然以约定俗成的“合同”存在。

与此同时,在胡建军流转山林的过程中,问题随之而来。

“比如我要在山上建蓄水池,需要审批,就要带着一大堆的合同和这个山的林权证去办。但是他们的林权证有的找不到了,有的权属也变更过,这个蓄水池的事情可能就办不成了。”不仅如此,胡建军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,“这些合同拿到银行里没有用,他们不认可,不能贷款。而且,承包

了几年以后,有些人看到这块山值钱了,就想涨价或者不租了,这时候合同也没用了。因为法律规定就不允许转给你。”

不过,现在龙泉的流转经验开始在全省24个县市试点了。“龙泉那种方式,是个办法。”胡建军一边继续承包山林,一边开始跑林业局,“让他们也争取一下这种做法。”

终于,在刚刚启动的深化林业综合改革的利好下,胡建军得偿所愿了。言下之意,胡建军也能拿着这本红色的证,“办林地的抵押贷款或者项目审批了。”

“在率先完成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的基础上,开展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林业改革。”副省长黄旭明在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上介绍,在此次深化林业改革正式启动之前,“全省累计流转林地面积达1586万亩,共有8600多家非公有制单位投资林业,累计投资额近500亿元。”

国有林场篇:建德的改革路径

从“1000多人”到“改制下岗” 一个国有林场负债1600万

与集体林场处境不同的是,国有林场经历了3次起起伏伏。

也就在胡建军拿到证的同时,在建德国有林场“待了40年”的谢广森退休了。

“不舍得。”这位经历过3次国有林场改革的老人,双手摩挲着坐在火炉前回忆,“1974年在林场里看电影,4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收了50多元钱。”

当时刚刚被分配到建德林场的吕惠飞也还有印象,就在这个20亩大小的国有林场里,“1000多